

史学

出将入相的范仲淹

● 张念书

范仲淹是北宋的大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生于公元989年,死于1052年。官至参知政事,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体恤民情,为政清正廉洁。少有志操,为官后政绩卓然天下,成为一代名人。他作为政治家,参与主持了“庆历新政”;作为思想家,他所培植的“泰山学派”直接促进了宋代理学的产生,朱子、程子都尊他为理学的先驱;作为军事家,他在防守边塞的战争中,“号令明白,爱抚士卒”,采取正确的策略,经常取胜,军威大振,宋仁宗称赞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作为文学家,千载之下,即便是对范仲淹的生平事迹不甚了解的莘莘学子,一提起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也会对他的人品满怀景仰之情。范仲淹一生出将入相,功业文章,彪炳青史;人品道德,壮志情操,传颂千古。现在,我们在加快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仍然需要从范仲淹身上汲取有益的营养。

范仲淹从政40年,仕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许多地方有他的遗迹和传闻。范仲淹出生在徐州,祖籍苏州吴县,但他

的青年时代是在山东邹平度过的,因而邹平、长山一带有他的许多遗迹和传说,有些村名的由来也与他有关。据《宋史·列传七十三·范仲淹》中记载:“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把“长山”考据为其他地方是不对的。还有的写成他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长白(今山东省章丘县)朱氏,在朱家长大。”(见《中学古代散文注析》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346页。)这就与实际不符。“长白”是山名,即长白山,是隋末邹平人王薄领导农民起义,作《无向辽东浪死歌》的地方。此山位置在邹平城南,章丘(绣惠)以东,周村西,长山的西南,其三大主峰即白云山、会仙山、摩诃山及绝大部分山脉在今邹平县境内。长白是山名,非县名也。史书记载籍贯,写州、县,而未见书山名之先例。再者,长白山虽占有长山县的部分地方,但距长山城五十余里,且长白山的两个主峰摩诃山、会仙山等皆在邹平县西南,而不在长山县境内。况且长白山上也无朱氏人家。而长山是县名,自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

定长山县名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于1958年并入邹平县,从未改易。想必《宋史》不会把具有显赫政绩的范仲淹的仙乡何处记错的。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两岁时父亲范墉去世,母亲谢氏便在范仲淹四岁时改嫁到山东长山县的一个姓朱的人家,从此改姓朱,名说。就是今天长山城南关外的河南村。长山南关的河是发源于淄博市的孝妇河,自东向西流经长山南关。河南村及毗连在一起的朱家庄,至今姓朱的很多。过去很多人弄不明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长山河南村朱氏家谱里会有范仲淹的名字,现在看来,并不奇怪,道理就在这里。传说,范仲淹的继父朱文翰家人对他不好,又受到乡里顽童的欺辱,一气之下,他从家逃跑了,想出家当和尚,路经邹平城东南的黄山,山上有神庙,但没有大的寺院,便找到了长白山最高峰(海拔826公尺)——摩河山西的醴泉寺,被寺里高僧收留。从此,在这里读书。现在邹平民间有很多传说,生动地描述了范仲淹在这里读书时的勤奋好学,艰苦生活的情况。后来,醴泉寺修有范文正公读书堂、范公祠等古迹。窘迫的生活境遇迫使他自小刻苦自学,及至做官后同情人民的疾苦。成年后,他了解到自己的家世,便辞别母亲,到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刻苦自学。据《宋史》记载:“他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考中了进士,“甲第九十七名”,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把他的母亲从长山县接去。后改做集庆军节度推官以后,他改回原姓,改朱说为范仲淹。任大理寺丞后,母丧去官。当时,大文学家晏殊在应天府当知府,把他召去应天府掌教书院。“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当时官虽不大,但立志改革,向朝廷上万言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见《宋史》)母丧期满后,又被晏殊推荐为秘

阁校理。由于范仲淹早年发愤攻读,精通六经,尤其对易经深有研究,当时许多读书人都纷纷向他求教。他曾经免去自己的俸禄用以供给四方的游士,对游士们平等相待,热情讨论。据《宋史》记载:“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的博学多才,得到了宋仁宗的重视,召为右司谏。他为人清廉,保持了成名以前的简朴生活,对官场上骄奢腐化,极为仇视。史书记载:“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贍族人。汎爱乐善,士多出其门,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虽然这些是出于封建文人之手,对范仲淹歌功颂德未免有些过多,但也说明了他关心同情民间疾苦,办了许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据《长山县志》记载:范仲淹改姓还吴以后,仍念朱氏顾育之恩,“乞以南郊封典,并于孝妇河南置义田四顷三十六亩,以贍朱氏。”范仲淹在苏州吴县置义庄这里就不多说了,方志与正史的记载互相印证是一致的。范仲淹对皇帝、权贵,刚正不阿,敢于直言指斥。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朝廷在开封汴京城内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木材要从陕西运来,给百姓带来很大灾难。他劝阻仁宗说:“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以蠲除积负。”又如,天圣年间,长江、淮河一带旱灾蝗虫严重,范仲淹请皇帝派官吏去赈济灾民。宋仁宗并不予以理睬。于时,他就对宋仁宗生气地说:“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皇帝被迫派他去安抚。他每到一地,开仓救济灾民,禁止百姓求神拜佛,并上书请求免除苛重的徭役赋税,提出改革弊端的十件事。由于范仲淹连番进谏,耿直讨人嫌,引起宋仁宗的不悦,将他赶出朝廷,出任地方官睦州知州。一年多以后,又调任苏州知州。这时正遇上苏州闹大水,泛滥成灾,田地

淹没，百姓不能耕种。范仲淹就组织人力“疏五河，导太湖注入海。”工程未竟，他又调任明州，经转运使上奏朝廷，才留下继续完成了苏州的水利工程，制止了水患。由于他在地方上政绩卓著，朝廷又把他召回京城做官，先后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等职。他仍然耿直不阿，不向权贵摧眉折腰。当时吕夷简执掌朝政，尽提拔他所亲近的人。范仲淹上百官图，提出非议，引起吕夷简的不满。不久，廷争建都之事，范仲淹与吕夷简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吕夷简诬他结党营私，离间君臣，被罢免朝官出任饶州。朝中欧阳修等人对此，愤愤不平，也被株连贬官。后来，范仲淹重回朝廷，吕夷简仍为宰相，宋仁宗让他主动跟吕夷简消除隔阂，他说：“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他坚持不向宰相吕夷简让步。

宋仁宗宝元年间，西夏王元昊进扰北宋西北边境，朝廷需用人才，又任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在平定西夏骚扰边境的战争中，显示出了范仲淹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长期以来，居住在甘肃、宁夏、陕西北部的党项族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建成西夏国，常常进犯北宋的陕、甘各州。北宋的军队屡遭失败。范仲淹经过调查研究，根据北宋的兵力很弱的现状，积极采取一些有力的方略措施。他在延州（今陕西省延安一带），大力修筑城寨，加强防御，主张坚守。将原来“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兵将一万八千人，分为六将，每将统领三千人，平时负责训练，战时指挥战斗。这样分工明白，责任清楚，调动了将士的积极性，这就大大加强了宋军的战斗力。此外，他还采取了正确的办法，积极努力，争取了居住在北宋、西夏之间的羌族等少数民族，使其与宋朝有良好的关系。范仲淹多次下令给这些少数民族的黎民百姓解决耕田牛具等，按照丁口借粟米，以解决种子口粮。同时，允许开放边界，让两边的群众互通贸易，友好

往来。对少数民族的首领归附的，真诚相待，不加猜疑。结果，沿边的少数民族被争取过来，不仅对制止西夏进扰西北边陲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加强了西北各少数民族与宋王朝的友好关系。羌族人当时曾亲切地称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许多羌民供奉范仲淹的画像，为他立生祠。后来范仲淹死的时候，《宋史》的记载是这样的：“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范仲淹在防守边关的战争中，“号令明白，爱抚士卒”，更加他采取正确的策略，所以经常取胜，军威大振。为此宋仁宗曾称赞他：“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范仲淹的声望从而大大提高，其实这个时候的北宋王朝内部却弊端百出，危机四伏。于是在陕甘边陲局势稍稍稳定之后，宋仁宗便把范仲淹赶快调回朝中，任为参政知事（即副宰相），并多次向他问治国安邦之策。

出将入相的范仲淹，真是忧国忧民，在朝廷重用他的时候，他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亲自下手诏，并打开供奉宋太祖像的天章阁，召见范仲淹等人，决心改革。范仲淹向宋仁宗皇帝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提出了全面改革朝政的十项主张：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这些内容包括了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经济，重视农业，加强军事，注意法纪、减轻人民负担等等。这次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主张精兵简政，裁减冗官，任贤授能的这些改革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积极的作用，有进步性，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宋王朝的社会危机，这次改革，在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改革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尽管范仲淹态度坚决，日夜工作，致力于实施改革措施，但是由于保守派贵族、官僚的反对和

阻挠,又一次遭到诽谤、诬陷,新政实行不到一年就告夭亡。《宋史》对此是这样记载的:“天子方信范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布,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从此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出任河东、陕西宣抚使、陕西四路安抚使、知邠州等职。多年的劳碌奔波和改革失败的郁闷,使他积劳成疾。他因病请调邓州,后又到荆南、杭州、青州等地做官。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病,请颖州,未到而途中病死于徐州,生于斯,死于斯,终年63周岁。死后葬于河南省伊川县少宝山脚下,其墓地约十多亩,全植柏树。现在唯一矗立的是范仲淹的门生欧阳修撰文并手书的“范文正公神道碑”,虽已逾九百年,但碑文依稀可辨。墓前有清代所建的墓碑,上书“范文正公之墓”,还有石祭坛、石翁仲两个,均已倒卧荒草。右有范仲淹之母和两个弟弟的坟墓。附近有范庄,几十户人家,姓范的居多。据范庄姓范的人们说:清乾隆年间,他们的祖先从苏州迁来,以示仰慕先人,在此守墓。范仲淹妻李氏,生有四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二子纯仁自幼聪慧,该苦读书,“至夜分不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事亲至孝。父亲去世以后,兄纯祐有心疾,“奉之如父”。从布衣做官到宰相,颇有政绩,他曾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贤地位也。”范纯仁确实继承了范仲淹先忧后乐之志,显示了治国辅弼之才,《宋史》说他:“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范纯仁知齐州时,对其父生长之故里长山及朱氏一族一往情深,据《长山县志》记载:“及忠宣公巡按山东,又置义田一顷三十亩,于孝妇河北。”

范仲淹作为封建王朝统治阶级中的一员,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自然不能超出封建社会的范畴,不能把它同今天共产

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思想相提并论,但在当时提出这样的思想,并身体力行,是难能可贵的,具有它的先进性和积极意义。《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改革失败后的第二年(1044年)写的,以此勉励自己,勉励朋友,这就更难得,更可贵。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看他为今天提供了什么,主要应看他与当时同时代的人相比,与前人相比高出了些什么?有什么创新?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对社会有什么推动作用?同是封建官吏,有的争权夺利,投机钻营,贪脏枉法,结党营私,荼毒百姓,这种人当然不能忧国忧民。有的不满意尔虞我诈,贪脏枉法,但又怕身受其害,搞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洁身自隐,伯夷叔齐式不食周粟。这种人于国于民,也很难说有什么好处。相比之下,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是高出一筹。实际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千百年来,这句格言激励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仁人志士致力于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谈到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时说: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以教育党员,加强党员的修养。除了《岳阳楼记》以外,范仲淹还留下了一些千古绝唱的文学作品,著名的诗《江上渔者》,词有《渔家傲》等。范仲淹的著作有《范文正公集》传于世。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孟祥中)